

譚世寶 著

JINSHIMINGKE
DE
DANZAI
JIUAOSHI

金石銘刻的 巡迴九澳史

清代巡迴九澳廟宇碑刻鐘銘等集錄研究

譚世寶



SEU 2600138

廣東省出版集團
廣東人民出版社

2600133

K877.42

16

世寶著

金石銘刻的 巡歷九澳史

清代巡歷九澳廟宇碑刻鐘銘等集錄研究



廣東省出版集團
廣東人民出版社

·廣州·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金石銘刻的氹仔九澳史：清代氹仔九澳廟宇碑刻鐘銘等集錄研究 / 譚世寶著. —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1.4

ISBN 978-7-218-06735-3

I. ①金… II. ①譚… III. ①寺廟-碑刻-研究-澳門-明清時代
②鐘-金文-研究-澳門-明清時代 IV. ①K877.424②K877.34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資料核字（2010）第 075034 號

JINSHI MINGKE DE DANZAI JIUASHI; QINGDAI DANZAI JIUAO MIAOYU BEIKEZHONGMING DENG JILUYANJIU

金石銘刻的氹仔九澳史：清代氹仔九澳廟宇碑刻鐘銘等集錄研究

譚世寶 著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人：金炳亮

責任編輯：張賢明 柏 峰

裝幀設計：張力平

出版發行：廣東人民出版社

地 址：廣州市大沙頭四馬路 10 號（郵政編碼：510102）

電 話：（020）83798714（總編室）

傳 真：（020）83780199

網 址：<http://www.gdpph.com>

印 刷：廣東信源彩色印務有限公司

書 號：ISBN 978-7-218-06735-3

開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張：15.25 插 頁：7 字 數：240 千

版 次：2011 年 4 月第 1 版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價：58.00 元

如發現印裝品質問題，影響閱讀，請與出版社（020—83795749）聯繫調換。

序一 孤燈寒夜 集腋成裘

——序譚世寶教授《金石銘刻的氹仔九澳史》

1994年香港大學文學院召開第七屆亞洲族譜學術研討會，我奉邀參加，與會期間結識了譚世寶教授。由於我們都是研究檔案文獻學的，因而一見如故，頗有相見恨晚之感。

2008年，我受聘為臺灣成功大學歷史系客座教授，講授歷史檔案學，真是“大世界，小舞臺”，有個在歷史系讀書的學生叫譚學超，學習好，人英俊，他告訴我，他家有一張我和他父親的合影，方知是譚世寶教授的公子，已成為了我的弟子，這就叫緣分。遂和譚教授書信不斷，深獲教益。

我對澳門史知之甚少，但是對金石銘刻以及利用檔案文獻進行編史修志和史料考訂，我却情有獨鍾，那是我幾十年來研究和授課的主要內容之一。向譚世寶教授索要此書，先睹為快，汲取知識。為本書作序，一則盛情難却，二則寫寫自己拜讀的體會，以就教於譚世寶教授和其他方家同仁。

古往今來，人類一切自覺的言論行動以及所有的努力奮鬥，無一不是在以史為鏡，鑒往知來，用歷史的經驗和教訓，作為自己實踐活動的衡量準繩。但歷史於俯仰之間已成陳迹，消失在漫漫的夜空之中。歷史不能重演，後人不可能回到過去的年代，身臨其境地對過去的史實進行考察和認識。

可是，歷史却給後人留下了原始記錄——檔案。檔案是人們進入





文明社會以後，思想、言論和行動的自然形成的歷史記錄，由於它不是事後有意識的創作，因此，一般說來，其內容比較真實。“譽者不過其實，抑者不損其真。”

由於檔案的真實可靠程度要高於其他種類的文獻，因此當某人或某事在不同的文獻中記載有異時，多以檔案記載為準，是謂“今世賴之以知古，后世賴之以知今”。加之檔案內容不存在知識老化問題，再過一千年，研究孔子還得依靠《論語》，因而凡搞史學者，只能從檔案中去鉤沉索引，稽古探微。今人能見到歷史檔案，真是歷史對我們的厚愛。

檔案的歷史，可見之史雖短，可溯之源甚長，迄今僅見，早在殷商時代，就有了甲骨檔案。隨着生產力的發展，又產生了金石檔案、簡牘檔案、縑帛檔案以及至今通用的紙張檔案。其中的金石檔案，即譚世寶教授書中所說的“金石銘刻”，是中國歷史檔案的重要組成部分。

金石銘刻的“金”，亦稱“金文檔案”，是繼甲骨檔案后，我國歷史上又一種珍貴、特有的記錄文字的載體。中國青銅冶煉起源很早，大約產生於炎帝、黃帝時期，距今已有 6000 多年的歷史。青銅器正銘文鑄字始於商代，西周時發展到專為記事銘文而鑄青銅器，這種具有史書性質的金銅器，即譚教授在本書中研究的對象之一：鐘鼎銘文。

隨着鐵器的發明，尤其政治、文化的發展，人類又發明了石刻，目前所見中國最早的石刻文字是 1935 年安陽出土的殷代石簠，上刻有“辛丑，小臣”等十二個字，亦稱石刻檔案，和金文檔案合稱“金石檔案”。

甲骨檔案和金石檔案，為中華民族開宗立範之作，亦是炎黃子孫最初的記憶。由於當時生產力水平極其低下，人類智力尚未完全脫離原始社會色彩，加之書寫工具的稀少和書寫困難，根本不可能從事著述，只能粗略地記錄人們的活動以及簡單的自然現象。

由於紙張的發明，中國人在書寫載體上逐漸淘汰了甲骨、簡牘、



縑帛等，但是，金石檔案却始終沿用和流傳。考其原因，一是告慰上天祖先，以明心迹；二是留傳子孫后代，彪炳千古。金石銘刻集載體的文物價值與記事的文獻價值於一身，其本身就是一件價值連城的文化藝術品，因而四五千年來，人們始終保留了金石銘刻這一檔案形式。

譚教授撰寫本書的意義和價值在於：

首先，由於受到歷史的、人爲的、自然的影響，紙張不易長期保存，而金石銘刻則可保存幾千年。不過，鐘鼎銘文，尤其石刻碑文，不易移動，影響了人們廣泛瞭解其記載內容，受時間或空間局限，千里迢迢，到澳門看實物，極易淺嘗輒止，不甚了了。今譚教授花費心血，將清代氹仔島、九澳島廟宇現存的碑刻鐘銘以及香爐等其他一些有銘刻文字的金石文物拍照附印，收集於書內，圖文并茂，集腋成裘，既大大方便廣大學者，免於到處搜尋之苦，又為保存、弘揚中華民族文化，作出了有益貢獻，可謂功德無量。

其次，從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葡萄牙殖民主義者入侵澳門開始，澳門經歷了四百多年的殖民統治，不少紙質檔案受到不同程度的人為損毀，致使距我們今日并不遙遠的歷史，都因缺乏檔案史料而衆口紛紜，莫衷一是。幸虧中國人自古就有“勒石以刻功名”的優良傳統，僅在澳門就為後人留下了衆多的鐘鼎銘文和石刻碑文，它們真實地記錄了澳門史和中國史的一部分，極大地彌補了紙質檔案之不足。而且，這些鐘鼎石碑，本身還是極其珍貴的歷史文物，有巨大的保存價值，對於研究宣傳澳門歷史文化，起到彪炳千古之作用。

再者，金石銘刻雖然較之紙張，保存期限要長久得多，但是，亦不能萬古如斯，隨着歲月的流逝，金石銘刻也會斑剝鏽污，譚世寶教授的另一重要貢獻在於，他將凡前人有漏錄或省略之處，皆盡量看清或以殘文推測出全字和全句，以存文推測缺字和缺句的方式補上，凡前人的錄文、標點及分析說明有訛誤之處，皆逐一補正并加注說明。譚教授共加注補正漏誤多達四百多條，就連已經化為照片五幀的氹仔的三婆廟碑殘碑碎片，譚世寶教授通過對前人錄文及所附模糊照片以



及路氹歷史館所提供的目前已更加殘損零碎的實物新照之反復對比研究後，對它們作了新的拼合，按為三塊碑刻和按全碑的格式作出規範的錄文。三婆廟的修建歷史，因譚教授的努力而增加了盡量復原的三塊殘碑為新證。

金石銘刻在人們面前是“六親不認”的，你不下苦功夫學習、鑽研，你沒有淵博的學識，任你是皇親國戚、達官顯貴，你也不可能認識理解金石銘刻的文字，你沒有“孤燈寒夜相伴”的經歷，你在金石銘刻領域就不會有成就。

譚世寶教授以孜孜不倦的精神，廣博的學識，精辟的見解，對收集到的金石銘刻進行龐證博引、深入考證，其研究成果，金玉珠璣，彙集全書。再舉一例，以證明譚教授功力不凡：

他經過對所見有關澳門廟宇碑刻鐘銘等文物的細緻研究，揭示出今天氹仔的天后宮、關帝天后古廟以及路環的天后古廟等原本都是擁有龐大廟財及地產的大型古官廟。譚教授在對路環的天后古廟這一該島最大型而又最古老的官廟所歷盡滄桑歲月的分析研究中，聯係澳門半島的同類廟宇的情況，尤其對該廟兩塊僅存的近現代重修碑文的研究，考證出該廟始建於清康熙十六年丁巳（1677年）。該廟最初建立之碑文及鐘鼎銘文，以及後來在清乾隆十八年癸酉（1753年），道光六年丙戌（1826年）和道光二十二年壬寅（1842年）一系列的在型重修記事題名碑文，皆被挖毀得一干二淨，縱影全無，原因何在？

經過譚世寶教授細緻入微的研究，結論是，自康熙十六年至道光二十二年的天后古廟金石銘刻，記載了中國政府對九澳（路環）行使主權，而修建此廟，並使其擁有得到中國官方明確認可和保障的龐大廟宇的房地產等財富的史實，這些金石銘刻記載，顯然不利於葡萄牙對九澳島的佔領和殖民統治；特別是這些金石銘刻對上述內容的記載，還印證了葡萄牙佔領者勾結澳門的一些華人竊取此官廟財物及產權的罪證，他們有意毀壞這些金石銘刻，以毀罪證。

譚世寶教授在本書中，利用有關廟宇的金石銘刻，還揭示出一些

歷史之謎的真相，或大膽提出自己的懷疑，引導史家去深入考證。由於譚教授的高深見解，整個氹仔、九澳兩島的一些歷史疑案之真相也相應連帶揭示出來。例如，根據偶有所見的氹仔、九澳的碑刻鐘銘或匾聯提及有關廟宇所在地之名稱，譚教授認為這些名稱原本都是有關廟宇所在地之名稱，由於沒有任何清代檔案史料可資證明這些小地方之名稱，有的後來擴大上升成為全島之名，譚教授經過考證，斷定有關的流行說法是現代才出現的誤說。

譚世寶教授對清代氹仔、九澳廟宇金石銘刻的集錄與研究，極大地豐富並提高了對金石檔案、澳門史、宗教史乃至清史的學術領域和學術水平，有的還填補了學術空白。澳門回歸祖國后，澳門史、宗教史、檔案史的發展，面臨可以充分利用各種載體的檔案文獻，充分著書立說的大好時代，譚世寶教授嘔心瀝血，披瀝而成的新書，將成為學人奮鬥的楷模。

劉耿生*

二零一零年三月七日

於北京中國人民大學信息資源管理學院（原檔案學院）

* 劉耿生，1944年出生，1966年大學畢業，正值“文化大革命”動亂，在農村勞動，間或教書歷12個寒暑。1978年進入中國人民大學檔案系任教，講授歷史檔案學，現為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檔案學會檔案文獻編纂委員會副主任，並曾兼任臺灣政治大學歷史系、臺灣淡江大學歷史系和臺灣成功大學歷史系客座教授。



序二 孰為天官斷公案 殘碑發覆繼絕學

——拜讀《金石銘刻的氹仔九澳史》

我捧讀世寶兄送過來的一大疊新著書稿，看見那書名就想到，此書與他承上的那部《金石銘刻的澳門史》分明是決意“分而治之”的安排，無疑是在為 20 世紀的澳門史翻一樁大案。

張海鵬先生（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委員、中國近代史研究員）就認為，《金石銘刻的澳門史》“從澳門官公廟產金石銘刻的發現整理中，得出了迄未引人注意的澳門歷史”，該書之研究結論及建議“值得引起學術界和澳門政府的注意”。（《金石銘刻的澳門史》序言）——由此推得世寶兄特意“分而治之”的《金石銘刻的氹仔九澳史》，將更加充分地為當今全澳門地區的官民理性地妥善解決澳葡政府所遺留的明清時期中國官方及公眾之廟宇及其相關的“歷史公案”問題，提供了不容任何人抵賴的客觀證據。

在澳門史的研究當中，有關氹仔、九澳之歷史及其與澳門半島之間的關係和相異之處，向被中外史學界所忽略。本書的重大價值在於通過對氹仔、九澳現存碑銘為原始資料之搜集整理，相當直觀而真實地再現了氹仔、九澳區劃史實的歷史斷層圖像。

其一，通過實物和文獻資料的比對，揭示了兩地人口之社會構成及其來源是“各種不受中國正統王朝的中央和地方政府管轄的勢力和人口——諸如宋、元、明、清等改朝換代之時反抗失敗的流亡者、中外海盜和不入政府編制戶籍的商、漁、農、士、僧侶等各色人等，因此他們所踞居的海島常常會被朝廷及地方政府暫時性地排斥於縣級的



戶籍賦稅之版圖之外。——世寶兄此一研判的論確為系統探討澳門地區之社會生活史和宗教文化史提供了實證的借鑒。

其二，指出氹仔、九澳的歷史文化和居民群體與澳門半島（更精確地說，指的是 macau 城區，亦即當今標示的“澳門歷史城區”）之間的若干重要差別。此兩地區在 1851 年和 1864 年以前純為中國人群蟄居的島嶼，外國船隻一般只是停泊於該兩島之水域，外人一般亦不登陸上島，“故歷來除中國廣東土著的‘島夷’之外，就惟有外來的本省派駐的軍隊以及本省的商、漁、工匠或盜賊入住”，這些人等在當地的社會生活狀況雖有縣志以及其他史著的記載，但並不是十分充分。著者探隱發微，竭盡所能搜得殘碑剩鐘之史料為證，勾劃出了當地居民在社會、宗教及經濟生活中的諸種特徵，揭示了該居民之社會構成決定了其“人口和經濟及城市的發展規模以及速度就日漸落後於澳門半島”的事實，從碑刻鐘銘上著眼，“除氹仔、雞頭、九澳等古地名純屬粵人粵語的命名之外，還可以從其廟宇的碑刻鐘銘所列的眾多建修捐助者和建造者的題名、籍貫都是粵人而不像澳門半島有相當部分是閩人”的情況，此誠為“見前人之所未見”而“發前人之所未言”之一新發現，從極細微處彰示了該島與半島所形成的居民群體構成之重要區別。

其三，世寶兄“分而治之”的實證研判對於理解澳門宗教史上之多元現象甚有助益，我認為在這方面具有方法論之意義。長期以來，葡人在澳門執行的是完全有異於在印度果阿的宗教政策。在果阿，葡人主要實行強迫性的皈依政策，即以強制手段迫使當地的穆斯林和印度教徒改宗天主教，然而在澳門，葡人卻採取容忍當地華人民間宗教存在的權宜策略。這在西洋教堂林立的澳門半島可見一斑，而在其勢力較弱的氹仔、九澳則更是琳琅滿目了。從世寶兄書中的一段精彩描述可見其歷史眼光獨到之處：“兩島的廟宇所信奉的神靈，除了如關帝、天后、北帝、土地等為國家確定為全國性祀典規定之神，以及觀音等也是全國民間早已形成的普遍信仰之神，而粵地信眾都已使之本土特色化之外，其他大多是源於或主要流行於廣東省的具有本土地方





特色的神祇。諸如起源于惠州而主要流行於廣東沿海的三婆神，為粵船人所信奉。主要流行於粵地城鄉而為粵人自古信奉的南海最高神靈——南海洪聖廣利大王（簡稱“洪聖大王”）、源于廣州的金花女神以及源于惠州的譚仙聖（俗稱“譚公”）等皆是主要流行於粵地的。這也是氹仔、九澳兩島的中國居民的構成與澳門半島有較大差異之處。”此段辨析入微的論述淺出深入，相當有說服力地揭示了整個澳門地區之宗教與文化的多元性及其複雜性之中的豐富性。

“以物證史”之具方法論意義的特色在世寶兄的澳門史“探真”系列論著中隨處可見。其具方法論意義的閃光之處乃在於“證偽”的史識和學力。實物乃歷史存在之載體，它們的本真性和客觀性拒絕任何概念化和格式化的任意解讀。世寶兄常用的“探真”其實應讀若“證偽”，俗話就是“打假”，這不單需要學識和學力，更需要勇氣乃至大無畏精神。按照馬克思的說法，學者必須不憚於面對自己召來的“復仇之神”。所幸者澳門已經回歸祖國，在“澳門學”這塊處女地上從事學術開荒亦進入了“打開天窗說亮話”的新世紀。世寶兄敬業樂業的專業精神令吾等十分敬佩，他為了“發現澳門”而付出了大量時間和艱辛勞作，其最終的學術期待不言而喻，那就是要為曾被扭曲了的澳門的歷史討回個“公道”！

我認識世寶兄已逾十五年，彼此沒有“利交”，大抵是由《文化雜誌》而“結緣”。記得1995年我家搬遷到澳門新填海南岸公寓，見到對門正在裝修，廳堂及幾間臥室的牆上全釘滿實木書櫃。哪位“讀書破萬卷”的教書匠竟這樣子來澳門落戶的？原來是有點兒佛相的世寶兄，而那對門的所在卻是我近年才明白的“悉曇齋”。

我與世寶兄因《文化雜誌》而“結緣”，然而豈止如此，我覺得可說是結了個“不解”之緣：我先是對他的“佛學博士”甚不解，繼而對他的“歷史語言學博士”全不解；風風雨雨嘈嘈雜雜經過了十多年，直到前不久世寶兄贈送一本他的最新巨著《悉曇學與漢字音學新論》給我，才恍然大悟。世寶兄的“雙博士”與“悉曇齋”之絕妙好處，



都在“誨文校字亦吾師”（世寶兄的一句詩）的常年交往的記憶之中一一浮現了。

我還是在這本《金石銘刻的氹仔九澳史》中找個例子來說明一下“悉曇齋雙博士”做學問的妙處。世寶兄從《海道圖注》（1874年由英國金·約翰輯、傅蘭雅口譯自懷遠王德均之筆述）中對十字門之描述（“……十字門為最便泊船處，以東面有二高島，南曰九澳，北曰大拔。……大拔以西，與馬格里勒以東，其間深二拓半至四拓之處，亦便泊船。”）進行考對，指出“大拔”即“雞頭”，就是氹仔的葡文地名 Taipa 的漢語譯音；“馬格里勒”就是“舵尾”之外語 Makareera 的漢字擬音之回譯。世寶兄由此推斷 Taipa 很可能是源於漢語“大舶”的對音，認為以此作為可以停泊當時最大最多船舶港灣的海島外文名稱是頗合適亦頗有理據的。

我十分欣賞世寶兄這種充滿想像力的實證考據方式。這也就是我所欣賞的所謂“具有方法論意義”之所在。我覺得世寶兄是沿着先輩學人如王國維、胡適之、陳寅恪的路數自覺“接着”走下去的，似乎可以用“小心假設、大膽求證”這八個字來概括我對世寶兄做學問的深刻印象。

謹此我想借用魯國堯先生（中國音韻學會會長、南京大學教授）點評世寶兄那堪稱“絕學中的絕學”之巨著《悉曇學與漢字音學新論》（中華書局 2009 年版）的說法，我覺得即使在所謂“澳門學”這道目前還相當模糊的地平線上，世寶兄勇於挺身突進的學術姿態亦可借用“異軍蒼頭突起”一語點評之。

黃曉峰*

二零一零年四月底

抄寫于《文化雜誌》工作室

* 黃曉峰，歷史學博士，澳門文學家，現任澳門特區文化局《文化雜誌》中文版主編。

目 錄

序一 孤燈寒夜 集腋成裘

——序譚世寶教授《金石銘刻的氹仔九澳史》…… 劉耿生 (1)

序二 孰為天官斷公案 殘碑發覆繼絕學

——拜讀《金石銘刻的氹仔九澳史》…… 黃曉峰 (1)

第一章 清代氹仔、九澳廟宇碑刻鐘銘等集錄研究導論 …… (1)

- 一、氹仔、九澳與澳門半島在明清史志及地圖的記載源流
差別 …… (1)
- 二、氹仔、九澳兩島與澳門半島的古代歷史文化發展的
差別 …… (8)
- 三、近年來有關氹仔、九澳兩島的歷史研究略述…… (15)
- 四、本書對氹仔、九澳廟宇碑刻鐘銘等的研究簡介…… (21)
- 五、結 語…… (28)

第二章 清代氹仔、九澳廟宇碑刻鐘銘綜錄表…… (31)

- 一、氹仔廟宇碑刻鐘銘綜錄表…… (31)
- 二、九澳（路環）廟宇碑刻鐘銘綜錄表…… (42)

第三章 清代氹仔、九澳廟宇碑刻鐘銘附照錄文點校…… (48)

- 一、氹仔島…… (50)
- 二、九澳（路環）島 …… (169)

參考文獻 …… (228)

跋 …… (230)



第一章

清代氹仔、九澳廟宇碑刻鐘銘等集錄研究導論

一、氹仔、九澳與澳門半島在明清史志及地圖的記載源流差別

欲明瞭清代氹（潭）仔、九澳（路環）廟宇碑刻鐘銘的歷史意義，必須先知氹仔、九澳兩離島在明清歷史中的地位。要知氹仔、九澳兩離島在明清歷史中的地位，必須先知氹仔、九澳兩離島與澳門半島在明清史志及地圖的記載源流差別。從自然地理和歷史政治的人文地理來看，明清時期的氹仔、九澳兩離島與澳門半島本為一獨立單元，其被強制扭合在一個行政區之內並名之為“澳門地區”，是自 1849 年開始澳門半島被澳葡逐步侵佔後的三十年間。經過葡萄牙一百多年的殖民統治，殖民主義者為侵佔“澳門地區”而炮製的各種歷史謊言長期流行，從而造成了“習非成是”。加上很多原始史料因各種自然和人為的原因而流失、湮滅，以致目前中外的有關記載異說紛紜。此外，不僅中文的“濠鏡澳”與“澳門”的源流關係錯綜混亂，而且葡萄牙人另起的 Macao（本指泊口，古代葡文地圖在緬甸的白古、廣州、香山、東莞等處港口皆曾標有“Macao”之名）、Macao 島（本指香山島）、Macao 城（本指澳門半島中間的澳門街市）等名詞也混雜其間，這就更加糾纏不清了。再加上近現代葡佔澳門半島及澳門地區（含澳門半

島、氹仔、九澳等離島）的過程中，逐漸把澳門、澳門地區與 Macao 混為一談，以致造成“以今代古”的現象——很多歷史概念混亂，既令人不知“濠鏡澳”、“澳門”及“澳門地區”的歷史源流，更令人完全忽略了氹仔、九澳與十字門的歷史源流。雖然，筆者在近十年間已撰寫、發表了一系列論著作探討“濠鏡澳”與“澳門”的歷史源流問題。^① 但是，對氹仔、九澳與十字門的歷史源流問題，則是最近纔開始撰文論述。^② 因此，本文仍有必要先對明清史志及地圖中有關“澳門”與氹仔、九澳兩島所屬的十字門的自然及人文地理記載源流差別作一基本的考察分析。

（一）氹仔島、九澳島、澳門半島以及澳門與十字門的命名關係考辨

澳門半島以南的氹仔、九澳兩島，是西洋船舶進入粵珠江口必先經過的著名“十字門”的組成部分，在澳門半島於 1557 年成為葡人入居的船口之前，其港灣早已是西洋各國船舶的主要停靠地方之一。如清暴煜修、李卓揆纂《香山縣志》云：

先是，番船泊無定所，率擇海濱地之灣環者為塢（澳）。若新

① 筆者主要論著有：（1）《Macao、Macau（馬交）與澳門、馬角等詞的考辨》，原刊於《文化雜誌》中文版第 35 期，附圖多幅。簡體中文本刊於《開放時代》第 6 期，廣州市社會科學院 1998 年版。修訂本載入譚世寶：《澳門歷史文化探真》，中華書局 2006 年版，第 114—164 頁。（2）《濠鏡澳、澳門與 Macao 等的名實源流考辨》，簡體刪改本原刊於《文物》1999 年第 11 期。修訂本載入《澳門歷史文化探真》第 197—217 頁。（3）《“Macao”在華的變遷及明清對澳門地區的管治史探真》，本文原在慶祝香港大學創校九十週年明清史國際研討會上報告發表，2001，4，第 27—29 頁，香港大學中文系。後載入《澳門歷史文化探真》第 359—370 頁。（4）《對伯希和“Macao 說”誤譯誤批的解析》，本文原刊於《歷史研究》2004 年第 6 期，中國社會科學院。後載入《澳門歷史文化探真》第 495—512 頁。

② 胡慧明、譚世寶：《明清廣東沿海史志及地圖的一些問題新探——以“十字門”的記述為中心》，刊於澳門大學中國文化研究中心編：《明清廣東海運與海防論文集》，澳門，2007。





寧則廣海、望峒，香山則浪白、濠鏡、十字門……明嘉靖三十二年，番船趨濠鏡者言舟觸風濤，水漬濕貢物，願暫借濠鏡海地晾曬。海道副使汪柏許之。時僅草舍數十間。後商人謀利者，漸運磚瓦木石為屋，若聚落然，居住輸租。自是諸澳俱廢，惟濠鏡澳獨為舶藪焉。^①

而且，澳門半島本名濠鏡澳（澳）而無澳（澳）門之稱，反而十字門澳（澳）較早被稱為“澳門”。如乾隆十年（1745年2月1日—1746年1月21日）分巡廣南韶連道薛韞在實地巡視考察後所撰《澳門記》云：

自香山縣鳳棲嶺迤南，凡一百二十里至前山，又二十里為濠鏡澳……遵澳而南，放洋十里許，右舵尾，左雞鷄（按：薛韞《澳門記》原文作“頸”）。又十里許，右橫琴，左九澳。灣峰表裡四立，象箕宿，縱橫成十字，曰十字門，又稱澳門云。^②

由此可見，“澳門”本是“十字門”的“又稱”。但是，乾隆十五年（1750年2月7日—1751年1月26日）張甄陶所撰《澳門圖說》卻說：

澳門在廣州府香山縣之東南，去縣治陸路一百四十里，水路一百五十里。凡海中依山可避風、有淡水可汲曰澳。又東有大十字門，西有小十字門，海舶由以出入，因呼曰澳門。^③

此說是澳門半島加上其“又東有大十字門，西有小十字門，海舶

① 〔清〕暴煜修、李卓揆纂：《香山縣志》卷八《濠鏡澳》，乾隆十五年（1750年2月7日—1751年1月26日）刻本。

② 〔清〕印光任、張汝霖著，趙春晨校注：《澳門記略校注》，澳門文化司署1992年版，第26頁。

③ 引自南京圖書館古籍部編：《澳門問題史料集》，中華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第467頁。

由以出入”作為其被稱為“澳門”的緣由。至完稿於乾隆十六年（1751年1月27日—1752年2月14日）印光任和張汝霖合著的《澳門記略》上卷《形勢篇》的開篇卻又增加新說云：

濠鏡之名，著於《明史》。其曰澳門，則以澳南有四山離立，海水縱橫貫其中，成十字，曰十字門，故合稱澳門。或曰澳有南臺、北臺，兩山相對如門云。^①

通過對照，可知上引《澳門記略》對濠鏡澳、十字門與澳門之名實來由關係的描述解釋，實是糅合了上述薛韞《澳門記》和張甄陶《澳門圖說》的說法成一新說，再加另一新說。首先，其前說與《澳門記》及《澳門圖說》同異之處有兩點：其一是十字門的組成採用薛韞的四島構成一個十字門之說，而不用張甄陶的四島分東西兩對共構成大小兩個十字門之說；其二是澳門之名稱由來不用薛韞“十字門”的“又稱”之說，而基本採用張甄陶的“澳”加“十字門”的“門”之說。其次，增加一新說，指濠鏡澳因本身既有濠鏡澳的“澳”，加上又“有南臺、北臺，兩山相對如門云”，故可合稱為澳門，這實際是把“澳門”作為“濠鏡澳”一地的新名。因此，可以說在《澳門記略》之前，曾先後有三種名同而實異的“澳門”得名原因之說。由於《澳門記略》影響巨大，故其書流行之後，實際為中國官民普遍採用，祇是第三說把“澳門”作為“濠鏡澳”一地的新名。如道光十五年乙未臘月（1836年1月18日—1836年2月16日）賜進士出身奉政大夫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加二級加員外郎銜南海何文綺撰的《重建三街會館碑記》云：

今之澳門，則舊濠鏡也。在香山大海中，起一石埂，廣十餘丈，長六里許，如蓮之有莖，中途甕城即關閘。踰之，抵澳門，

^① [清] 印光任、張汝霖著，趙春晨校注：《澳門記略校注》，澳門文化司署 1992 年，第 1 頁。